

杨荫浒

文章写作二十五讲

Wenzhang Xiezu Ershiwu Jiang

文章写作二十五讲

杨 荫 浒

吉林人民出版社

文章写作二十五讲

杨荫沅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8印张 205,000字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360册

统一书号：7091·1483 定价：0.95元

目 录

一、文须有益于天下·····	(1)
二、文以意为主·····	(13)
三、着意原资妙选材·····	(26)
四、立片言而居要·····	(39)
五、文章不是无情物·····	(50)
六、功在构思·····	(62)
七、言之有序·····	(72)
八、文似看山不喜平·····	(80)
九、起句如爆竹，结句当撞钟·····	(90)
十、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103)
十一、语不惊人死不休·····	(118)
十二、修辞立其诚·····	(132)
十三、题好一半文·····	(143)
十四、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	(153)
十五、写短些，精粹些·····	(164)
十六、文贵创新·····	(174)
十七、文章不厌改，多改出华章·····	(187)
十八、要有一个好的文风·····	(197)
十九、心里要想着读者·····	(214)

二十、根深才能叶茂·····	(220)
二十一、观察——写作的一项基本功·····	(228)
二十二、要有广博的知识·····	(237)
二十三、劳于读书，逸于作文·····	(247)
二十四、勤写苦练无休止 写到生时是熟时·····	(260)
二十五、善为文必先善为人·····	(271)
书尾说明·····	(282)

一、文须有益于天下

1 “文须有益于天下”，是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的一句话。顾炎武虽然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家，这句话却正确地道出了文章写作的根本目的。顾炎武一生关心“民生国命”，“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结合当时社会实际，不断研究探索，写了大量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地理等方面的著作，对当时的社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有些至今对我们仍有参考价值。

写文章是有目的的，而且应该有益于天下。但是有人不承认这点。他们说，写作不应受什么明确意识支配，更无须考虑社会效果。

西方有位资产阶级作家说，他写东西没有什么目的，“也不管正确与不正确，只想写得越动人越好，至于他的读者里头，有人看过他的作品以后自杀了，他不管”。^①

在中国，也有人叫喊过为写作而写作。二十年代“新月派”提出：文学“要在理性范围内自由地创造”，“除了他自己的内心命令，文学家没有任何使命”；三十年代，“自由人”“第三种人”又鼓吹所谓“自由文学”，说什么“文学与艺术，至死是自由的”，文学的最高目的就是脱离社会的自

① 转引自柳青《谈谈生活和创作的态度》一文，《文艺报》1960年第13、14期。

由，标榜所谓纯客观的、没有目的的写作。

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从事任何活动，都是一种自觉的行为。人类在实践某项活动时，尽管事先的设想可能有所变更，但是总要有个设想的，这正是人类高明的地方。马克思指出：

“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①人的活动如果事先打不上意志的印记，就无异于动物。写作也是这样。不论写什么，作者总是根据客观实际提供的某些情况，为着某种目的的。写作无目的，就象开车没有方向，采掘没有目标一样。关于这点，我国古人已有明确的认识。宋代黄庭坚说：

“文章功用不济事，何异丝窠缀露珠。”^②资产阶级某些作者，尽管打着为写作而写作的旗号，或者单单视写作为自我表现，实际他们的写作是不能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他们的所谓“猎取”，他们追求的所谓“动人”，其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只不过是低级、庸俗罢了。至于有些人打着写作“自由”的幌子，却醉心于制造精神毒品，实际是在资本主义商品法则的支配下，用以迎合资本家的心理，欺骗和毒害人民，以达到为资产阶级效劳的目的。

写文章是一种意识活动。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需要交流，于是就要表达。写文章就是一种表达。但是这种表达，决不是主观的、盲目的。“观念性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③人们写什么或不写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不那样写，不是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02页。

② 黄庭坚：《戏呈孔毅父》。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2版跋，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于主观的冲动，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社会生活决定的。明人李贽说：“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①这说明，作文都是由于外界事物的触动，到了“不能自止”的程度，为“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才写作的。

从实际中看，文章家、作家的写作，也都有着明确的写作目的。前面提到的黄庭坚说：“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②“趣”，是趋向，指的就是写作宗旨。唐代诗人白居易写“新乐府”五十篇，他说全是“系于意，不系于文”，“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③清代著名戏曲理论家李笠翁在《闲情偶寄》里给自己定有七条写作原则，其中四条就是作书的目的：“一期点缀太平，一期崇尚俭朴，一期规正风俗，一期警惕人心。”^④可见，作文是有目的的，而且是和人生社会联系着的。

有人说，我看见什么就写什么，写真实就是目的。这是一种糊涂观念。写真实是对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及其生活细节，是现实主义文艺的基本特征；非文学作品，则要求严格意义上的真实，决不允许虚构编造。但这里有两点

① 李贽：《杂说》。

② 黄庭坚《答洪驹父书》。

③ 白居易：《新乐府序》。

④ 李笠翁：《闲情偶寄·凡例》。

需要澄清：一是写真实并不是目的。真实是就内容而言，目的是指写作动机。考察作者的写作动机，不能仅仅以是否真实为依据。所写事实虽然是真实的，但并不一定就能表明作者是什么写作目的。有的可能反映了作者纯正的目的，有的可能反映了作者恶劣的写作动机，有的可能什么也看不出来。其次，对于“真实”这一概念，也应给予科学的理解。真实的东西是客观存在的，但它也是复杂的。有的有意义，能说明问题的本质；有的则没有什么价值。我们写文章，不是照像，不是记流水账，而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提炼和概括，更本质、更集中、更真实地反映客观。这就要对客观事物进行鉴别和选择，加以科学的分析，不然就不能真实地反映客观实际。

有一些文章，写的是山川景致，生活小品，看来没有什么明显的思想涵义，但能不能说写这些就没有目的呢？不能。通过风光景色的描写，生活情趣的记叙，赞颂山河的壮丽，说明人世间的一些道理，让人赏心悦目，陶冶性情，同样是目的。何况有些景物描绘，又是寓情于景，托物言志。“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这写的是天地变色，但和作者元好问所处的时代环境联系起来，不难看出，山河草木的冷落凄凉，衬托着国家的残破、战乱带来的灾难。凄惨的景色，荒凉的气氛，“皆著我之色彩”。诗人是在借景抒情，表达他忧国忧民的心情。有些小品文，“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①这是鲁迅对小品文写作的基本认识。所以说，写任何文章都是有目的的。“写作而没有

① 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4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目的，又不求有益于人，这在我是绝对做不到的。”^① 托尔斯泰做不到，别人同样也做不到。

2 应该确立什么样的写作目的？清人焦循曾将文章归为两大类：“文何用？有用之一身者，有用之天下者，有用之当时者，有用之百世者。科举应试之文，用之一身者也，应酬交际之文，用之当时者也；二者之于文，皆无足轻重。若夫朝廷之诰，军旅之檄，铭功纪德之作，兴利除弊之议，关于军国之重，民物之生，是文之用于天下也。”^② 尽管古人所说的“用于天下”，有的是出于封建的忠君思想，但多数文章家、作家的写作，是为国、为民、为着整个社会的。正是抱着这一崇高目的，他们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著作，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教育和鼓舞了人民，推动了历史的前进，有的甚至为此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屈原愤恨楚王室昏庸和贵族的腐败，主张政治改革，为此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最后投江自尽。司马迁发愤写《史记》，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针贬现实。施耐庵“虽生元日，实愤宋事”，“宋室不竟，冠履倒施”^③，于是作《水浒》。曹雪芹写《红楼梦》，也是为了“补天”。这种为天下的写作思想，在近代、现代更为普遍。中国现代著名新闻记者林白水，宣传爱国，反对军阀，他在《社会日报》上写文章对北洋政府的军阀官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嘲骂。他曾慷慨地说：“现在是豺狼当道，我左手提着头，右手拿着笔，写尽世上不平事，骂尽那些狗东西。”

① 列夫·托尔斯泰日记，1852年11月28日，《外国作家谈创作经验》（下）469页，山东人民出版社。

② 焦循：《与王钦莱论文书》。

③ 李贽：《忠义水浒传序》。

由于他用辛辣的笔，英勇地揭露了反动派，最后被杀害，为写“有益于天下”之文，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至于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象高尔基、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伟大的作家，他们的写作，已经和整个无产阶级事业，和人类的彻底解放联系起来，写作完全是一种战斗的需要，就更是为国、为民、为天下了。

写作所以要为公，也是由文章的性质所决定的。文章和口头说话一样，它是表达思想、交流感情的一种工具。文章从它产生开始，就为社会所需要，成为社会之公器。“文章者，天下之公器，非我之所能私”^①。在文字产生以前，人们用结绳，是为了记事。我国最早的刻在兽骨、龟甲上的文字，也是记载占卜和其它事情的。这说明文章的出现（应该承认那也是一种文章，只是简单粗陋罢了），完全是由于社会的需要。

“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且人能一乎心至乎道，修身则无咎，事君则有立。及其无位也，惧乎心之所有，不得明乎外，道之所蓄，不得传乎后，于是乎有言焉，又惧乎言之易混也，于是乎有文焉。”^②文章就是这样为传道而明心，为传乎外，传乎后，为弥补口语易混之不足而出现的。它一开始就具有社会性，为社会所公有，因此，为文必须服务于社会。

从文章的客观效果看，也必须有益于天下。任何文章，只要走向社会，被人阅读，就已经是作为社会关系的一个环节而存在了。鲁迅指出：“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一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除非你不作

① 李笠翁：《闲情偶寄·结构第一》。

② 王禹偁：《答张扶书》。

文，不开口。”^①我们既不要过分夸大文章的社会功能；也不可低估它的影响。有时这种影响是很大的，它可能要影响许多人，甚至要影响整个社会，影响到经济基础的变革。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影响到经济基础。”^②既然如此，写文章就不能不考虑社会效果。目的明确、纯正，社会效果就可能好；目的错误，就可能产生坏影响。“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③历史上许多革命的进步的著作，对社会的发展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最初的传播，主要是靠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欧仁·鲍狄埃的一支歌，传遍世界，唤起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高尔基的《母亲》，鲁迅和其他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曾教育无数青年走向革命。这就是好文章产生的巨大效果。反过来说，有些不好的文章，也要起反作用。有些青年走上犯罪的道路，是因为他们读了某些黄色的作品；有时候社会上形而上学猖獗，歪风邪气泛滥，是由于受了某种错误宣传的影响。“若夫……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④所以，我们必须考虑文章的社会效果，要致力于写作有益天下的文。

当然，对于文章的有益于天下，也不要理解得太窄。一切直接参加政治斗争、支持社会变革的文章，固然是好的，但

① 鲁迅：《三闲集·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第4卷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② 恩格斯：《致海·施塔根堡》（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517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③ 王充：《论衡》。

④ 顾炎武：《日知录·文须有益于天下》。

是，文艺作品，科学论著，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文等，同样是社会需要，对公众是有益的。“文须有益于天下”，不单是看它写什么，主要是看他为什么写和怎样写，看作者的主观动机和文章的客观效果。一切为了社会进步，为了公众需要，能给人以健康的、积极的、有用的文章都是好的、应该肯定的。有关生产斗争的总结，科学实验的报告，工程技术的介绍，社会和自然科学的论著，都使人增长知识，开发智慧，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变革社会的能力；有关文艺作品，包括山水诗，风景画，也能使人陶冶性情，获得美感，从思想上受到启发，从精神上得到享受；至于应用文，更是社会需要，为人们所离不开的。

3 要写出有益于天下的文，首先要做有益于天下的人。作文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也是做人的问题。一个建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把自己的生命和整个社会，和千百万劳动人民联系起来的人，他想着社会，想着大众，笔下写的必然也是公众所关心的事。古往今来，凡是对社会公众有过积极贡献的文人作家，他们的文章所以有益于天下，起过好的作用，关键是这些人为人好。他们了解社会现实，关心人民疾苦，懂得人民心理、要求和情绪，有的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所以能够体察民情，为人民说话，表达人民的愿望和情绪，成为人民的代言人。“文章常助百家鸣”（邓拓），敢鸣，鸣得对，而且真正为百家鸣，归根到底决定于作者的为人。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这是“四·五”事件时写在天安门前的革命诗词，作者在这里说的正是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当时所要说的话。

在那样恐怖的日子里，敢于写出这样震天撼地的诗句，没有对“四人帮”强烈的憎恨、对周总理无比怀念的感情，没有忧国忧民的思想以及斗争的决心和信心，是写不出这样的诗句的。好人决定了好文。反过来说，如果作者思想颓废，没落反动，他就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可能是歪曲事实，散布毒素。所以要写有益于天下的文，必须做有益于天下的人，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其次，要掌握好文章这一武器。关于写文章，有些人不重视，常常把它看作是文人舞文弄墨，或者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事。自己不会写，也不学习。这些人重视生产，重视打仗，重视科学实验，就是轻视文章的作用。把文章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固然是错误的，但把它看作可有可无，也是不对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①对于笔杆子的作用，许多先人有过深刻的认识。李笠翁指出：“武士之戈矛，文人之笔墨，迺治乱均需之物。乱则以之削平反侧，治则以之点缀太平。”^②又说：“武人之刀，文人之笔，皆杀人之具也。刀能杀人，人皆知之，笔能杀人，人则未尽知也。然笔能杀人，犹有或知之者，至笔之杀人，较刀之杀人，其快其凶，更加百倍。”^③法国文学大师巴尔扎克的寝室里有一尊拿破仑的小塑像，在塑像的刀鞘上，巴尔扎克写有这样一句话：“他用刀未完成的事，我要用笔来完成。”他正是用笔，写出了《人间喜剧》，反映了法国资产阶级发展的一个完整时期。恩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849页。

② 李笠翁：《闲情偶寄·凡例》。

③ 李笠翁：《闲情偶寄·戒讽刺》。

格斯称赞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给予了我们一部法国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编年史”。我国二十年代很有影响的《京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邵飘萍，他曾用“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来勉励报社人员，他自己用强劲犀利的笔，不断揭露封建势力和军阀反动派。冯玉祥将军对他有过这样的评价：“飘萍一枝笔，抵过十万军”。可见好的文章，在社会上会起巨大的作用。所以我们要重视笔杆子，学会写文章，用以为人民服务。

第三，对读者要有强烈的责任感。人的思想，只要写下来，就会形成生命，产生影响。因此，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从立意选材到语言文字的表达，都要严肃负责。列夫·托尔斯泰曾经尖锐地批评过当时上流社会的一些作家，他说：“这些人士，他们原来为的以精神食粮服务于那些赡养他们、给他们吃给他们穿，免除他们劳动的人们，而结果却这样的忘掉自己的责任，以至忘记创作那对人民有用的食粮，而且把不负责任看作自己的美德，这难道不是最严重的疯病？”^①这话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我们有许多人在写文章，其中多数是好的，但也有些很差，对此，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以为愧，反而洋洋得意，自命不凡。这些人所以能写出无益于天下的文章，其根本原因是作者忘记了曾赡养他们的人民，忘掉了写作的社会责任。“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②“文以千数，流传于世。”^③既然这样，就要特别认真，决不可马马虎虎，掉以轻心。

① 《文学研究集刊》第4册第338页。

② 曹丕：《典论论文》。

③ 王充：《论衡·佚文篇》。

第四，内容要好。“文章为明道理之具。”^①“道”，可以理解为内容、道理、观点。文须有益于世，主要是内容有益于天下。凡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读者能从中受到启发和教益的，就应该肯定为好文章。“文贵夫顺合众心，不违人意，百人读之莫不，千人闻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满室，言堂满堂。’”^②这就是佳作。当然，一篇文章让所有读者都得益，都满意是不大可能的，但这应是作者写作的指导思想。周恩来同志生前很关心青年记者的成长，他把记者比作战士，要求他们“走路力求正确，说话力求正确，至于写文章，更要写得力求正确。”^③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第五，多触及现实问题。人们写文章，常常是有感于现实，出于肯定或变革现实的某种要求或愿望。“文章合为时而著”^④，这是写作缘起的一般规律。也写过去，但多数是为了对现实有借鉴。因此，要努力抓现实中的问题。如果抓准了，又给予明确的解答，文章即使写得平常，也会产生较大的反映。“因为它正好击中了当时绷得特别紧的社会的弦。”^⑤

在历史上，凡是被人称颂的文章或作品，大多是用不同形式，提出和回答了当时人们所关注的、带有方向性的社会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所以引起理论界的强烈反响，是因为它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它对澄清理论是非，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批判极“左”思潮，恢复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起了积极的作用。小说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

② 王充：《论衡·自纪篇》。

③ 转引自《新闻战线》1980年第1期36页。

④ 白居易：《与元九书》。

⑤ 加里宁语。转引自《新闻战线》1959年第4期14页。

《乔厂长上任记》所以受到公众的好评，是因为它塑造了新形势下工业战线上的一位勇于改革，实事求是，善于管理企业的领导干部的典型形象，正确地提出和回答了领导工业的新问题。列宁写文章就特别注意选题。他总是根据现实的需要，选最迫切的问题。例如，俄国工人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俄国资本主义能否发展，对革命运动的整个方向有重大意义，据此，列宁写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失败了，广大知识分子充满了颓丧情绪，甚至怀疑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于是列宁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日益临近了，列宁写了《国家与革命》，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的根本区别，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毛泽东等革命家写的每一科学论著，差不多也都是当时社会最迫切的问题，因此，他们的文章成为革命行动的指南。这也是他们的著作光辉不朽的一个重要原因。